

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以 1953—1957 年湖南省为中心的考察

陈益元, 梁利娟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湖南省的个案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和扩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另一方面,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以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代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做法,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安稳和农村社会的不安定。

[关键词] 统购统销;国家权力;农业生产;农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 F29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3-0107-05

Local Practice of the System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ural Society: Inspection of Hunan Province from 1953 to 1957

CHEN Yiyuan, LIANG Lijuan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case of Hunan province revealed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in the 1950s, on the one hand, is conducive to the deepening, infil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state power,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fields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practice of replacing commodity economy and market mechanism with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national plan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unsteadi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in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state pow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society

近年来,随着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统购统销与农村社会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探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执行层面的研究,考察的重点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变化轨迹及历史评价问题;^[1-4]二是地方实证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从县乡个案的层面,分析统购统销制度在地方的运行轨迹、遇到的问题 and 效果评价。^[5-7] 这些研究,有的是国家宏大

收稿日期: 2017-12-04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和改造场景下湖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949—1956)” (15YBB03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研究:以 1949—1957 年湖南省为个案”(14A042)

作者简介: 陈益元(1966-),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梁利娟(1992-),女,四川岳池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

层面的叙事,关注地方基层不够;有的虽然研究视野下移了,但叙事逻辑大多还是国家政策制度在地方的展开,缺乏对统购统销制度地方实施过程中矛盾冲突的考察和对农民主体性的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以湖南省为考察中心,从上下互动的视角分析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以深化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

一 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新走向

统购统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土改后为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以及农村农民生活水平上升后食用粮的增加,粮食供求关系日益紧张,原来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粮食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要。同时,为推动农业合作化开展,也需要从生产、生活领域进行组织和制度的重构,^[8]这样,统购统销制度与合作化运动互为促动、互为强化,共同塑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统购统销要顺利推行,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确保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作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的生产。”^[9]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合作化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和强势话语。^[10]这样,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乡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合作化的推行”^[11]。湖南相继取消了全省粮食市场,粮食征购的力度加大了。

(一) 购销体制有利于农村政权建设的加强

为保证中央粮食购销体制得到落实,湖南省委规定了统购、派购的物资对象:(1)粮食、食用植物油、油脂、油料、棉花三种物资由国家实行统购。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应按国家分配的任务,向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交售。粮油上市须经过国家粮油市场,棉花上市须卖给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2)除接受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委托者外,其他任何公私商业单位和人员,采购农副产品,均须进入交易场所成交,不得直接向农业社和农民进行交易。^[12]

国家对农业社的粮食统购统销,以高级社为单位进行,农业社的粮食分配,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农业社、农业社与社员的关系。粮食分配的顺序是:以全年收获计算,首先要留出按照“三定”时核定的种子、饲料、口粮总数和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

征购任务。完成这两者以后,如再有余粮,方可根据本社的情况,照顾社与社员在“三定”留粮数量以外的其他需要。农业社自收获新粮开始,边收获、边分配、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不得先留本社用粮,后缴国家征购任务。在粮食入库中贯彻“先公后私”“先征后购”^[13]的原则,征收任务各地分配到乡、社,县乡向下分配任务不能少于上级分配数。

这样,统购统销从购销种类、渠道、方式,到购销过程中国家与社员关系的处理原则,再到粮食征购的政策限制,都有严格的界限和措施。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从农业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加强了对农民行为的限定。从此,农民“自由抉择的余地”更小,家庭经济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这种状况有助于“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14]农民被压向集体,又有利于政府通过集体组织的控制实现粮食的购销政策,从而实现国家以农业支持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两者是紧密关联互为强化的关系。

粮食购销政策的推行,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社采取了很多倾斜的优惠政策,许多农民为了逃避统购统销纷纷加入合作社,因为“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15]。合作化后,党和政府面临的是党所掌控的合作组织而不是利益分殊的单干户了,运用这种组织保证购销任务的完成,显然快捷得多、容易得多,因为“按合作社的帐本进行征税和设定授粮定额,远比对付一亿个分散的家庭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在粮食流入农民手中之前,国家就先从这些合作社中取走了应交的定额”^[16]。

(二) 网络建构与农村社会的组织化

在购销网络的构建中,充分依靠党系统的力量,调动各级党支部、骨干、积极分子和党员的积极性。基层政权系统从上到下组织专门的宣传员、在乡教员和中小學生,组成宣传队,采取不同的形式、特设的主题、变换的手段、攻心的策略以及宣传与组织联动的方针,深入到社到组到户,造成“走声势、走热潮”^[17]的社会舆论氛围。统购时,各乡镇充分发挥以党支部为核心的粮委会的作用。先确定乡的标准产量、留粮点水准、低产户核减产量等原则,再通过乡扩干会议,向农民宣扬有关定产定购的政策,确定任务到户。粮委会、党支部审查分配到各户的任务并召集乡骨干会。最后,骨干分头入社、入组,通过各个阶层的“拉手协商”^[18],排除阻力,取得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支持。

干部力量的加强和乡村组织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基层政权对农民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控制。方法上,贯彻由内而外、由上到下及层层发动、层层教育的方针。这样,党和政府的影响扩展到田土的数量和产量、粮食市场的设立和管理、农村居民的留粮标准等产供销环节。依靠基层政权的力量,由农业社、互助组到单干户逐层协商,消除粮食购销的不利因子。如此严密的粮食购销网络,极大地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它融经济、政治、思想于一体,把思想动员、组织优势、群众发动黏合在一起,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具体化,实行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和点面结合。这种全方位、多层面、跨领域购销网络的构建,使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几个主要的环节。统购统销的对象,先是粮食,后是棉花、食油,这样国家权力已深入到分配领域。它既配合了党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以掌握农民生产的目的,又使国家权力横向伸展到农民的生活领域。从此,农民在合作组织和统购统销双重压力之下,唯有加入合作组织才不致被弱化、边缘化。^[19]

二 乡村社会的不安稳、不安定

统购统销制度的推行,推动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走向的进程,但是,紧张的粮食购销形势,农民为生存而采取的变通行为,以及统购过头、统销不足等措施造成的偏颇,也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不安稳。

(一) 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社会关系较为紧张

查阅相关档案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比如,当时新邵县的生产秩序就极为混乱,农民情绪很不稳定。干部号召生产时,农民抱怨“饭都冒得(湖南方言,没有的意思)吃,还增个什么产”;号召发展互助组时,群众大会开不起来,有的农民说“冒饭吃互不起来”。^[20]农民,主要是中农的情绪相当不稳。富农、中农和新中农中较为富裕的一部分已开始出现送田、退佃和卖牛的状况。^[21]

紧张的购销形势,造成乡村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不少乡村出现了“闹米、闹饭”的不良局面;有的跑到饭馆去吃饭,还有的成群结队跑到乡政府要吃饭、要买米。^[22]在此境况下,不少乡干部很是紧张,退缩躲避起来。十三片党员廖××说:“我到片上开会,连头都不敢抬”,生怕群众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宣传党的购销政策了。^[20]

(二) 农业生产秩序错位,农民“反行为”层出

不穷

针对统购主粮作物(粮食),不统购杂粮作物(包括红薯、萝卜、荞麦等)的政策,许多农民采取了形式不一的规避行为。有的收买、囤积粮食,无形抬高了杂粮价格。桃江县红薯价格涨到与稻谷价格一样的水平,群众生产情绪很是低落。^[23]抱怨说“政府为什么不把杂粮也统了,免得那些冒良心的人来抬高物价”^[24]。有的农民埋怨“统购搞得太苦了”^[24],以各种方式进行抵抗破坏;有的放弃农业搞副业,对农业生产不理不睬;有的轻水田生产,重山土作物生产。

造成这种农业生产错位和农民反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1. 趋利避害。桃江县杨家坳乡中农杨××,其家6口人,8亩田。1953年,由于囤粮多,统购了5000多斤,而1952年只统购了800斤。他对政府统购很不满,认为妨碍了他个人的发展,因而对水田生产很消极,不积肥,却专门去开山土准备种红薯。

2. 钻政策的空子。杂粮的涨价,加上供销社收购土特产的政策,使得不少农民觉得搞山土作物、搞副业比搞农业划得来。水田不易耕作,谷子出来后又要统购,而杂粮不要统购,价钱又高。桃江县七区不少群众反映,开一亩土能收2000斤红薯,红薯黑市每担卖到6元,又不要统销,花工夫又少,种田不如开荒好。

3. 生存急需。统购过头,造成有的农民卖了部分口粮,不得不搞早熟作物或搞副业赚些现钱买杂粮。桃江县花桥乡中农文××,其家6口人,12亩田,1个劳力,应统购1200斤,但因受灾严重,经减灾统购800斤,实际还是统购得多了点。据乡干积极分子了解,他家统购后仅剩一石粘谷(种谷在内)和几斗糯谷,因而他不顾农业生产,专门开荒种植各种早熟作物以度春荒。^[25]

(三) 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1955年湖南省粮食定产量214亿斤太高,比1953年查田定产174亿斤要多40亿斤。实际上,3年来单位面积提高不了这么多。山区、丘陵区1954年定产偏高,实产量低于定产。中央提出留10%至20%的余粮,而湖南省规定只留3%至5%的余粮,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的要求,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以常德专区1955年至1956年产购销任务分布为例,全区定产稻谷515006万斤,较省原分配任

务多93万斤;征购136 442万斤大米,较省原分配任务多50万斤,统销大米40 135万斤,较省分配任务少销4 105万斤。^[24]各县算账普遍叫喊任务重,完成有困难。会同县总产量10 950万斤,除去口粮、饲料等8 670多万斤,加上农民定销400万斤外,实际余粮2 280万斤,而地委分配的定购和公粮任务为3 150万斤,相差870多万斤。^[26]

再从邵阳地区定产任务看,1955年每亩平均420斤产量,很多农民代表反映许多田达不到,全区有15%左右的一、二等田实际产量低于查田定产产量。隆回县5个区92个乡,45个乡中有69 109亩田查田定产数字高出实际产量414万斤(每亩高出将近60斤)。据统计,该县实际产量低于查田定产产量的田共相差产量3 600万斤。全区百余万亩田相差产量约5 000万斤。地委把省委分配的定购定销指标悉数分配到各县,全区购多于销12 129万斤。有几个缺粮的县留粮标准达不到省委的规定,如邵东、新化、新邵等县就达不到规定标准(省委规定每人平均470斤)。据反映,全区定购数不但不能多于定销数,反而缺粮(稻谷)4 000万斤。^[27]

上述粮食购销的情况,充分说明随着合作化成为农村工作的重心,特别是合作化高潮出现后,统购过头、统销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主要因素。问题严重的乡,如湘潭和桃源的两个乡,原留粮或计划供应的粮食吃不到接新的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5.5%、35.3%。^[28]这些缺粮户生活艰难,有的用糠菜和稀饭度日,其中还有个别户因缺钱而变卖家具、购买黑市粮食。在购了过头粮的社,干部和社员积极性都不高,社员对干部的意见很大。

统购过头,统销不足,加上“自留地”偏紧,衡阳专区农村普遍反映牲畜留料过少,影响动物饲养业的发展。在油料统销上,茶油统销指标偏低,如衡南县岗进高级社1956年每人每月平均约1两左右;产油区统销户,如宁远县梅家乡黄家社半年平均每人也不过半斤油。农民对城乡食油供应指标差额悬殊的意见很大。在工业品与农业品的比价问题上,农民非常反感。1950—1951年,衡南县三塘乡1斗米可买砂糖8至10斤,统购后则1斗米只能买3斤了。^[29]群众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四)干群关系和工农关系的不和谐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造成很多基层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不适,他们意见很大,对抗、不合作,成为

许多农民的行为选择。长沙九木乡七组陈兴海互助组员王××说:“这个政策不合理,刚刚有了饭吃,政府又要购粮,明年我不种双季稻了,种高粱(意思即政府不收杂粮)。”农王××说:“政府卡得太紧,人冒吃睡在屋里不能动,更别谈要搞生产了。”十五组范××(团员)、王××(组长)表现很积极,个别群众讥讽说:“我们组出了两个毛主席”,又威胁他们“说话要小心”。^[30]1956年冬到1957年上半年,少数社闹粮闹款问题严重。桃源县816个社,闹粮闹款问题严重的就达225个,占27%。有的不出工、骂干部,该县桑树社100多个妇女找社长要饭吃。亿万乡新化社每天30多个社员找社长要粮要款,社长躲避社员不敢见人。还有个别地区因粮紧钱缺造成粮荒,发生打干部等事件。零陵县发生了5起闹粮群众打干部事件。^[31]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农村基层政权干部、农业社干部也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湘阴县一个乡的党委书记说:“单干一身新,初级社打补丁,高级社巴补巴,社会主义要打扁膀(意指不穿衣服)。”有的干部抱怨说,现在是农民作田,工人享福,“耕田人冒饭吃,养猪人冒肉吃”。^[32]

这种种画面,呈现出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视野中。合作社优势的宣传、农村美好前景的许诺,已很难得到他们的响应。但是,路径一旦锁定,制度和政策的刚性力量又推动党和政府采取更为有力的举措来化解这种紧张关系。之后,中央相继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中国农村继续沿着集体化方向,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发展道路。^[33]

前面我们以湖南省为中心,实证考察了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农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全面、深刻的影响。湖南省的个案显示,统购统销制度的推行,从生产、分配、流通和农民日常生活等等诸多层面,强化了对地方基层干部群体和农民的动员和控制。由此,它成为有力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环,强化了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和扩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走向。但是,从湖南地方实践看,乡村社会的不安稳、不安定局面一直与之相随。从普通农民看,相继出现了抵触、不合作,以及闹粮、重山土作物轻水田生产、重副业轻农业生产等违反常态的做法。从干部群体看,既有对农民的强迫命令作风,也有质疑、埋怨的情绪和自利的行为选择。所有这种种

现象和状况,说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34]

参考文献:

- [1] 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2] 罗平汉.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3] 张学兵.“剥夺”与“改造”:统购统销制度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响(1953—1985)[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4.
- [4] 徐勇. 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J]. 中共党史研究,2008(1).
- [5] 田锡全. 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6] 葛岭. 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J]. 中共党史研究,2010(4).
- [7] 李婉琨,曹树基. 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J]. 中共党史研究,2012(3).
- [8] 胡帆,周岳龙. 历史昭示未来,坚持中国道路:苏联解体的教训及走中国道路的启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5):28.
- [9]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
- [10] 陈益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研究述评[J]. 中共党史研究,2014(3):107.
- [11] 武力. 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17(5):53.
- [12]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指导下的自由市场暂行管理办法(1957)[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807.
- [13]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1957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1957年)[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807.
- [14]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75.
- [15]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31.
- [16]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 陶鹤山,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16.
- [17] 十四区统购工作报告(1953)[A]. 醴陵县档案馆档案,档案号4—2—86.

- [18] 一个乡粮食定购工作作法的意见(1955)[A]. 醴陵县档案馆档案,档案号4—2—126.
- [19] 陈益元. 合作化运动中的基层政权与农村社会:以1953—1957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J]. 社会主义研究,2005(3).
- [20] 新邵县汤仁乡的粮食统购的不稳定状况(1954)[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4.
- [21] 关于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的第二次报告(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538.
- [22] 秋征工作情况综合(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10.
- [23] 关于桃江县目前农村各阶层生产情绪的调查报告(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116.
- [24] 新邵县汤仁乡粮食购销情况(1954)[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84.
- [25] 会议情况(第16期)(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453.
- [26] 会议情况(第14期)(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453.
- [27] 会议情况(第17期)(1955)[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453.
- [28]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农村粮食统购工作的指示(1956)[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649.
- [29] 衡阳专区有关农村各项经济政策执行与问题的调查报告(1957)[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417.
- [30] 长沙九木乡完成统购入库后深入检查发现的一些问题(1953)[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6—1—71.
- [3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49—1978年):第2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74.
- [32] 关于湘阴县在粮食任务分配上和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和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57)[A].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1—1—825.
- [33] 陈益元. 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J]. 中共党史研究,2012(2):109.
- [34] 陈益元. 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1949—1957):以湖南省为研究个案[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337.

责任编辑:黄声波